少年刑事程序辯護之歐洲比較*

文／ Prof. Dr. Frieder Dünkel 譯／王士帆、林萱恩

上

壹 前言

壽星 Werner Beulke 教授對於被告受律師扶助權等訴訟權的投入，幾乎無人能出其右。他所發表之文章，尤其也在他的教科書裡[1]，持續將刑事案件之辯護作為研究重點[2]，特別是在少年刑事程序之辯護[3]。壽星對所謂的《科隆準則》（Kölner Richtlinien）[4、譯註]有決定性之參與，這份準則至今仍是解釋少年刑事案件強制辯護（notwendige Verteidigung）規定的指導綱領。

以歷史脈絡觀之，少年刑事程序辯護的問題其實不算什麼議題。在傳統福利國家的少年刑事法底下，辯護人比較被視為是外來物，這是因為少年法官是以其自我理解的少年「最佳利益」來審理案件所致[5]。從而，法治國程序權利的擔保固然一直存在於歐陸的少年刑事案件體系，卻未必包含辯護人在場權這層含意[6]。然而，隨著少年刑事法體系自 1960 年代中期開始朝有利於司法模式（Justizmodell）的新方向加強，以及 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的通過，出現了徹底的轉變，這波轉變也使少年刑事案件之辯護成為核心議題。在德國，少年辯護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主要應歸功於壽星的提倡與著作—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便不再被質疑，但也許仍有一個問題備受討論，亦即，在少年刑事案件的辯護中，辯護人的教育觀念及「教育能力」是否也應該或必須扮演著特殊的角色[7]。

貳 德國法之少年刑事辯護

於德國少年刑事法，與辯護有關的問題規定在德國《少年法院法》（JGG）第 68 條。這一特別規定，用在補充德國《刑事訴訟法》（StPO）第 137 條以下的一般性（辯護）規定，而依據《少年法院法》第 68 條第 1 款，《刑事訴訟法》的一般性（辯護）規定對於少年及甫成年人（Heranwachsende）亦有重要性。此外，《少年法院法》第 109 條第 1 項規定，為了對甫成年人可能的安置而鑑定其發展狀態（少年法院法第 105 條）時，應為其指定辯護人（參見少年法院法第 109 條第 1 項準用第 68 條第 4 款）。至於在改革政策面上，長久以來所要求的甫成年人羈押程序也應有強制辯護一事，亦即將《少年法院法》第 68 條第 5 款之適用範圍擴大至此年齡層之訴求，已於 2010 年 1 月 1 日生效之《刑事訴訟法》第 140 條第 1 項第 4 款修正條文中實現。不過也因此，《少年法院法》第 68 條第 5 款幾乎沒有獨立的功能[8]。只是，依據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 140 條第 1 項第 4 款，辯護人—少年法院輔助機構也是如此（參見少年法院法第 72a 條第 1 句之規定）—僅於核准羈押後才是強制參與，這樣的條文規範從改革政策來看，仍有所不足；相較於此，要求於羈押審查時，亦即於羈押裁定之前，便將辯護人納入程序，洵屬允當[9]。

雖然法律已明文規定羈押（或暫時安置）應行強制辯護（這也適用於甫成年人），然而，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140 條第 2 項這個一般性規定，該條項裡的不確定法律概念，卻絕對有在適合少年的解釋範圍內進行闡釋之需要，像是「犯罪之嚴重性……，事實或法律情況之困難度」，或是「被告顯然不能為自己辯護」。在德國文獻，特別是 Beulke 教授在強調少年辯護的特殊性，尤其在少年刑事案件之事實或法律情況之困難度或在欠缺防禦能力的認定方面，認為應採取有利於少年的從寬解釋[10]。有鑑於多數少年刑事犯具有特殊狀況，且於學校教育中社會化不足，Beulke 教授的觀點顯然無庸置疑。《科隆準則》也據此要求所有於少年參審法院與少年法庭之程序、有使少年遭受刑罰之虞之程序以及所有救濟程序，又或於面臨撤銷緩刑的執行程序，皆應屬強制辯護案件[11]。

在德國有爭議的是，少年刑事案件之辯護人是否應該或必須如同《少年法院法》第 37 條對法官及檢察官之規定一般，也表現出其於教育方面的能力。具有少年犯罪學的知識對於少年辯護有意義且有助益，這點一再被正確地提到[12]。惟另一方面，辯護人在少年刑事程序並非擔任教育人士。有些教育工作者對少年施以強烈干預基本權利的教育措施（例如命令服務 300 小時的社區勞動），這些措施雖與少年犯行不合比例、卻具有教育少年的正當性。歐洲的建議方案與最低標準也為辯護人提供了一個良好的遵循方向[13]。就此，縱使我們對辯護人具有「教育涵養」予以肯定[14]，也不表示辯護人因此卸下傳統之辯護義務，也就是說，辯護人仍有維護少年權益，而指摘不符合比例原則之教育干預措施的辯護義務。

以下扼要說明歐洲與國際上的若干發展，它們對德國的上述改革需求提供了參考基礎，尤其是—如筆者所指出—強制辯護方面。

參 歐洲及國際之建議方案或最低標準

辯護人選任權被視為是「法治國程序的基本要素」，而此種權利也在「歐洲與國際之建議方案及最低原則 」（europäische und internationale Empfelungen und Mindestgrundsäze）中扮演卓越的角色[15]。

在所謂的 1985 年聯合國《北京規則》，其第 7.1 點和第 15.1 點規定了少年選任辯護人或是受一般性的（法律）扶助權利，且—只要各該締約國法律有所規定—也得享有無償法律扶助的權利。《北京規則》對於無償法律扶助之權利稍嫌不足的文字描述，歐洲的建議方案對之則有較為強化的闡述。歐洲理事會於 1987 年制定的「少年犯罪的社會反應」建議方案（R (87) 20 des Europarats über “Social reactions to juvenile delinquency”）中，其第 8 點要求包含警察詢問階段在內的全部刑事程序期間，應加強未成年人的法律地位，而這主要是藉由得請求無償法律扶助之權利，或是透過直接通知父母或其他合適之人的協助來實現。再者，在歐洲理事會「處理少年犯罪之新方法與少年司法之角色」建議方案（Rec. (2003) 20 über

（文轉三版）

註釋

* 本文譯自 Frieder Dünkel, Verteidigung im Jugendstrafverfahren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FS für Werner Beulke, 2015, S. 1107-1115.（德國 Werner Beulke 教授祝壽論文集，2015 年 3 月出版）。作者 Frieder Dünkel 為德國 Greifswald 大學教授，以犯罪學、少年刑事法為研究專長，詳見 https://rsf.uni-greifswald.de/lehrstuehle/ehemalige-lehrstuehle/strafrecht/lehrstuhl-duenkel/。

1. 參見 Beulke, StPO, Rn. 147 ff.
2. 參見特別是 Beulke 教授具「開創性的」教授資格論文：Der Verteidiger im Strafverfahren. Funktionen und Rechtsstellung, 1980；此外，Schaffstein/Beulke, Jugendstrafrecht. Eine systematische Darstellung, 14. Aufl., 2002, S. 214 ff.; Beulke, StPO, Rn. 147 ff.
3. 例如 Beulke, StV 1987, 458 ff.; Beulke, Jugendverteidigung, S. 170 ff.; Beulke, Böhm-FS, S. 647 ff.
4. 參見德國聯邦司法部，Verteidigung in Jugendstrafsachen, 2. Aufl., 1988; Beulke, Jugendverteidigung, S. 170 ff.; Schmitz-Justen, J., Hilfe durch Jugendstrafverteidiger?, in: DVJJ, Jugend im sozialen Rechtsstaat – Für ein neues Jugendgerichtsgesetz. Dokumentation des 22. Deutschen Jugendgerichtstages vom 26. bis 30. September 1992 in Regensburg, 1996, S. 480。所謂的《科隆準則》刊印在 NJW 1989, 1024 ff. 並附有 Walter 教授導讀。

—譯註：德國 1986 年 10 月在科隆城市（Köln）舉行少年法院大會（Jugendgerichtstag），隔年 3 月科隆大學犯罪學研究中心舉辦少年刑事案件辯護研討會，雙雙揭示少年辯護之不足。有鑑於此，德國法院暨少年輔助之聯合會的工作小組，成員包括 Beulke 教授在內，於 1988 年 11 月 26 日討論並通過所謂的《科隆準則》，指出少年刑事程序強制辯護的必要性和基準，例如應從警察初次詢問即應有辯護人在場等。

5. 關於制度比較之總述，參見 Dünkel, F., Grzywa, J., Pruin, I., Šelih, A., Juvenile justice in Europe – Legal aspects, polic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in the light of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 Juvenile Justice Systems in Europe –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 developments, 2. Aufl., 2011, S. 1839 ff.; Dünkel, Youth Justice Policy in Europe – Between Minimum Intervention, Welfare and New Punitiveness, in: Daems, T., van Zyl Smit, D., Snacken, European Penology?, 2013, S. 145 ff.
6. 參見 Gensing, Jugendgerichtsbarkeit und Jugendstrafverfahren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2014, Kap. 5.5.1.
7. 參見 Kreuzer, ZJJ 2008, 122, 125; Walter, NStZ 1987, 481 ff.; Schaffstein/Beulke（註 1）, S. 215 f.; Böhm/Feuerhelm, Einführung in das Jugendstrafrecht, 4. Aufl., 2004, S. 118; Laubenthal/Baier/Nestler, Jugendstrafrecht, 2. Aufl., 2010, S. 108 f.; zusammenfassend Gensing（註 6）, Kap. 5.5.1 (S. 508 ff.)。歷史發展方面，另參見 Baumhöfener, Jugendstrafverteidiger. Eine Untersuchung im Hinblick auf § 74 JGG, 2007, S. 5 ff., 11 ff.; Beulke, StV 1987, 458, 459.
8. 但是，在預期依《刑事訴訟法》第 140 條第 1 項第 5 款將甫成年人安置於收容所至少一段期間的情形，則有存在意義，參見 Diemer, in: Diemer/Schatz/Sonnen, Jugendgerichtsgesetz mit Jugendstrafvollzugsgesetzen, 6. Aufl., 2011, § 68 Rn 18；例如依《麻醉藥品法》（BtMG）第 35 條、第 38 條安置在少年矯正學校（Erziehungsheim）或毒品戒治機構，參見 Eisenberg, JGG, § 68 Rn 22.
9. 採此看法者，亦有「德國少年法院暨少年輔助之聯合會」（DVJJ），DVJJ-Journal-Extra Nr 5, 2002, S. 49；德國《刑事訴訟法》第 140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一般的羈押規定要求強制辯護乃屬「相對晚到」（當「轉轍器已被扳動」）的相關批評，參見 Beulke, StV 2010, 442, 445.
10. Beulke, Jugendverteidigung, S. 175 ff.; Beulke, Böhm-FS, S. 652 ff.; Schaffstein/Beulke（註 1）, S. 218 ff. 正確地提到將「外國兒童」（今日會稱其為「具移民背景的被告」）當作強制辯護的特殊類型（S. 219；亦參見 Beulke, Böhm-FS, S. 658）；對於《科隆準則》的總述與其在德國法之落實，另參見 Zieger, Verteidigung in Jugendstrafsachen, 6. Aufl., 2013, S. 166-176.
11. 參見《科隆準則》in NJW 89, 1025, 1026 f.；同樣的，德國少年法院暨少年輔助之聯合會的改革委員會於 1992 年及 2002 年提出多種建立在《科隆準則》基礎之上的建議；Schmitz-Justen（註 4）, S. 480 ff.；參見 DVJJ, DVJJ-Journal-Extra Nr 5, 2002, S. 46 ff.; Zieger（註 10）, S. 227 f.
12. 例如犯罪學上有充分正當理由的轉向處分優先性與儘可能廣泛避免少年刑罰和（或）必要時從輕科處少年刑罰，這些也都在本文之後介紹的國際建議方案裡。
13. 請見下文「參」，另外，關於以國際建議方案為背景的少年刑法之塑造原則，參見 Dünkel, NK 2008, 102 ff.; Dünkel, ZJJ 2011, 140 ff.
14. Beulke, StV 1987, 458, 459 ff. 亦採此見解，其提倡辯護人於此應具有衡平且理性的地位；相同意見，Walter, NStZ 1987, 481, 482 f. 有詳細論證。
15. 參見 Gensing（註 6）, Kap. 5.5.2 (S. 519 ff.).
16. 該建議方案第 15 點規定：“*Where juveniles are detained in police custody, account should be taken of their status as a minor, their age and their vulnerability and level of maturity. They should be promptly informed of their rights and safeguards in a manner that ensures their full understanding. While being questioned by the police they*

植根法律關係（稅法總論 第三冊）
教育法律資訊
稅捐法律關係（稅法總論 第三冊）
黃茂榮 著作 定價 800 元
買賣法（增訂七版）
劃撥帳號：07929998 戶名：植根雜誌社有限公司 TEL:(02)2707-2848 FAX:(02)2708-4428
訂購未滿 請自付郵
植根法律書
JUDICIAL 司法 訂閱辦法
本刊每 全年
費用新臺
如蒙 請郵政 帳 5005 帳
司法院

法律網 訊的最佳平台
稅法解釋與司法審查（稅法總論 第二冊增訂第三版）黃茂榮 著 定價 800 元
法學方法與現代稅法（稅法總論 第一冊增訂三版）黃茂榮 著 定價 800 元
1000元者 贈 65 元
書城熱賣中
WEEKLY 周刊
訂閱
劃撥 號 4377 戶
司法周刊

（文接二版）

"New ways of dealing with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the role of juvenile justice"）中，特別強調於警察拘捕時受有必要法律扶助與權利保護[16]。

這裡尤其應受重視的，是 2008 年《歐洲少年犯制裁規則》（European Rules for Juvenile Offenders Subject to Sanctions or Measures，簡稱 ERJOSSM）規定的少年被告權利[17]；這份基本規則的第 13 點要求「有效參與」刑事程序之擔保，並強調少年應至少可享有和成年犯罪人一樣的程序權利（處於相似程序處境即應禁止遭受差別對待）。《歐洲少年犯制裁規則》的官方註釋指出兩件事：其一表示，少年即使在單純的少年輔助程序也有請求法律扶助的權利；其二，少年在面臨剝奪自由的案件時，應行強制辯護[18]。《歐洲少年犯制裁規則》第 120.1 點至第 120.3 點的一般性條款也明確規定，於各種執行醫療或剝奪自由的制裁時，應給予全面的權利保護以及提供辯護權或被告權利。第 120.1 點提供少年及其父母和法定代理人，於科以制裁與其執行之所有程序，均有受法律扶助的權利，並且該扶助於必要時須是無償的（無償辯護，參見第120.3點）。就此而言，《歐洲少年犯制裁規則》的規定已經超越了德國現行法，如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BVerfG）所謂落後於國際人權標準的德國法規即具有違憲之「象徵效力」（Indizwirkung）的見解[19]，德國法即因此出現應將強制辯護範圍擴大及於即將面臨少年刑罰或撤銷收容這兩種情形的重大改革需求[20]。

除了被稱作「軟法」（Soft-Law）的聯合國或歐洲理事會的建議方案外，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則是被公認為具有拘束力的法律，其當然也應予以重視。依照《兒童權利公約》第 40 條第 2 項第 2 款第 2 目及第 3 目之規定，締約國必須確保未成年被告能享有請求法律扶助或其他援助之權利，這不僅在規範少年的受扶助權，而是更進一步強調於任何少年刑事案件皆應強制提供扶助[21]。而在剝奪自由制裁的核准或科處方面[22]，《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第 4 款要求確保少年被剝奪自由時，享有不受阻礙的法律扶助或其他援助之權利[23]。

再來是歐盟法。儘管歐盟在刑法及刑事訴訟法領域內僅具有限的權限，其仍在「指令」（Richtlinie）或「意見書」（opinion papers）中持續致力於推廣人權之最低標準。例如最近的 2013 年 10 月 22 日《於刑事程序及歐盟逮捕令執行程序之受法律扶助權與被剝奪自由時第三人通知權和剝奪自由期間與第三人及領事機關交通權之歐盟指令》（Richtlinie über das Recht auf Zugang zu einem Rechtsbeistand in Strafverfahren und in Verfahren zur Vollstreckung des Europäischen Haftbefehls sowie über das Recht auf Benachrichtigung eines Dritten bei Freiheitsentzug und das Recht auf Kommunikation mit Dritten und mit Konsularbehörden während des Freiheitsentzugs, 2013/48/EU），也以辯護問題為主題。其表示「共同最低限度條文應加強所有會員國之刑事司法信任度……」（參見指令立法理由第 8 點）。這個指令主要是談到刑事程序中取得法律扶助的權利，而且認為於第一次警察詢問時（參見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和第 2 款），尤其是在「被剝奪自由後」（第 3 條第 2 項第 3 款），即能行使該權利。而關於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的辯護權，在 2013 年 11 月 27 日歐盟議會與歐盟理事會《兒童嫌疑人或兒童被告之刑事程序擔保》指令草案[譯註]中，有強制辯護的詳細指示：應規定「對於刑事程序中之兒童嫌疑人或兒童被告，強制」提供法律扶助（參見決議建議 COM(2013)822 final 第 26 點）。據此，刑事程序中的未成年被告可被認為屬於強制辯護的案件類型。不過，2013 年 11 月 27 日的指令草案將輕微犯罪列為未成年被告強制辯護的例外，其第 29 點規定：「對於特定的輕微違法行為，倘若規定強制提供法律扶助權，乃不符比例原則。這尤其是針對被某些會員國當成犯罪的輕微交通違規、違反一般市政法規和違反公共秩序犯罪的輕微違法行為。會員國國內的權責機關，若其既非檢察官、亦非刑事法院者，並不需要對這些輕微違法行為擔保指令承認的不可或缺之法律扶助獲取權。」反面言之，這意味著在輕微違法行為以外的刑事程序應強制指定義務辯護人。另附帶一提，雖然前述 2013/48/EU 指令允許刑事程序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放棄法律扶助權，但作為附加擔保的《兒童嫌疑人或兒童被告之刑事程序擔保》指令草案則是規定兒童不得放棄這個權利。

肆 少年刑事程序辯護之歐洲比較

以下的比較法觀察，乃是以歐盟（2006 年至 2008 年）和德國 Mecklenburg-Vorpommern 邦教育部（2008 年至 2011 年）所資助的歐洲少年刑事體系比較計畫為基礎，總共 34 個國家參與其中[24]這份目標在於廣泛涵蓋少年刑法與少年執行之實體與程序層面的計畫，也包含少年刑事程序及該程序之參與人[25]。雖然計畫成果大多來自於二手資料，也就是以這些國家相關專家的國家報告為基礎，且各國的法條文句並非總是能清楚的重新解析，但以下的概覽仍可指出歐洲辯護規定的一致性與多樣性。惟先說明，以下概覽僅限於介紹幾個重要國家，或就強制辯護問題及辯護人參與程序時點有特殊規定的國家。

一、少年刑事程序強制辯護—西歐國家

西歐國家的法律扶助規定，在不少地方都比德國有顯著進步。

例如比利時，其在 2006 年改革後雖仍維持純粹的少年輔助法體系，但在少年法官審理之程序以及可能施以所謂的保護性措施時，一律要求辯護人參與程序。

在丹麥，所有由參審法庭或陪審法庭審理的案件，只要被告（不問年齡大小）沒有選任律師，便應指定義務辯護人[26]。

於芬蘭，所有未滿 18 歲之人從偵查程序一開始，就為其指定律師，除非「顯無必要」；另外，所有未滿 21 歲之人被命令羈押時也享有強制辯護[27]。除此之外，未滿 18 歲人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亦應參與少年刑事程序。

法國也是相同情形，該國全部的少年程序皆要求律師參與，而且從第一次警察詢問的偵查程序開始就應參與。即使只是可能施以被當作制裁看待的教育處分，也應由律師代理少年參與程序[28]。法國一樣越來越要求少年律師的專業化，但也許只在某些地區的部分專業領域才有貫徹[29]。

希臘隨著 2010 年的改革，亦即對於重罪之追訴一律指定義務律師的做法，使強制辯護原則在希臘獲得強化。惟對於希臘改革之評價，應考慮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批評，該批評已揭露希臘各種缺失和規避對策[30]。

在義大利，少年辯護人應透過教育課程以及進修課程來證明其專業程度。律師公會每年舉辦少年刑法等的培訓活動，還提供通過培訓的少年辯護人名單並持續更新[31]。此外，義大利特別重視父母或教養權人自偵查程序開始即應在場（參見 DPR 488/88 第 12 條）[32]。有鑑於義大利採取當事人程序，加上義大利辯護人呈現特殊之專業化，該國律師相較於德國律師可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不過，筆者未能取得更詳細的資料。

奧地利法律規定，在（預期）將向地方法院起訴的案件，自該案件之偵查程序即應有律師參與；此外，所有的暫時拘禁（羈押、暫時留置）也適用律師強制參與。在區法院的程序，則由少年法院輔佐人（Jugendgerichtshelfer）擔任辯護的角色，以協助少年的地位參與程序（參見奧地利少年法院法第 48 條第 5 項）[33]。就此而言，少年比成年人受到較好的對待，但這並不適用於甫成年人（指 18 歲以上、未滿 21 歲之人，參照奧地利少年法院法第 1 條第 4 款）。

葡萄牙特別重視少年之父母或教養權人的程序參與。另外，於法官初次訊問時即應指定辯護人[34]，可看出葡萄牙的強制辯護類型非常廣泛。

（下期待續）

（譯者王士帆為臺北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林萱恩為成大法律研究所碩士生）

註釋

should, in principle, be accompanied by their parent/legal guardian or other appropriate adult. They should also have the right of access to a lawyer and a doctor. They should not be detained in police custody for longer than forty-eight hours in total and for younger offenders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reduce this time further. The detention of juveniles in police custody should be supervis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關於國際標準在少年刑法的角色，參見 Dünkel, NK 2008, 102 ff.;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註 5）.

17. 參見 Rec. (2008) 11；對此之總述，Dünkel, NK 2008, 102 ff.; Dünkel, ZJJ 2011, 140 ff.
18. 參見 Council of Europe, European Rules for juvenile offenders subject to sanctions or measures, 2009, S. 40; Dünkel, NK 2008, 102, 111; Dünkel, ZJJ 11, 140, 144.
19. 參見 BVerfG NJW 2006, S. 2097.
20. 1987 年《科隆準則》早有此觀點，參見德國聯邦司法部（註 4）; Beulke, StV 1987, 458 ff. 及 DVJJ, DVJJ-Journal-Extra Nr 5, 2002, S. 46 ff.
21. 參見 Weidkuhn, Jugendstrafrecht und Kinderrechte, 2009, S. 48.
22. 這是指（如同《歐洲少年犯制裁規則》，但有別於《兒童權利公約》第 37b 條）所有剝奪自由的形態，參見 Schmahl, UN-Kinderrechtskonvention, 2. Aufl., 2013, Art. 37 KRK, Rn. 8, 13.
23. 《兒童權利公約》第 37 條第 4 款規定「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均有權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援助，並有權向法院或其他獨立公正的主管當局就其被剝奪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異議，並有權迅速就任何此類行動得到裁定」。對此另參見 Gensing（註 6）, Kap. 5.5.3（S. 542 f.）.

—譯註：歐盟已於 2016 年 5 月通過本指令（Richtlinie (EU) 2016/800, ABlEU Nr. L 132/1）。

24. 參見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註 5）.
25. 參見 Gensing, Jurisdi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juvenile criminal procedure in Europe, in: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 Juvenile Justice Systems in Europe –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orm Developments, 2. Aufl., 2011, S. 1607 ff.; Gensing（註 6）.
26. 參見 Storgaard, in: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註 5）, S. 333；此外，當檢察官聲請羈押時，亦應行強制辯護。
27. Lappi-Seppälä, in: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註 5）, S. 451.
28. 參見 Casteignède/Pignoux, in: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註 5）, S. 513.
29. 參見 Casteignède/Pignoux, in: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註 5）, S. 513; Gensing（註 6）, Kap. 5.5.2 (S. 523).
30. 參見 Pitsela, in: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註 5）S. 640; Gensing（註 6）, Kap. 5.5.2 (S. 524).
31. 參見 Cesari,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Italy, in: Patanè, V., European Juvenile Justice Systems, 2007, S. 247.
32. 參見 Padovani/Brutto/Ciappi, in: Dünkel, F., Grzywa, J., Horsfield, P., Pruin, I.（註 5）, S. 779；義大利《少年刑事訴訟法》（DPR）第 12 條要求："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to the juvenile defendant shall be granted throughout all stages of the proceedings either by his/her parents or other suitable person(s) chosen by the child and admitted by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33. 參見 Gensing（註 6）, Kap. 5.5.2 (S. 528 f.).
34. 參見 Botelho/Rocha,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Portugal, in: Patanè, V.（註 31）, S. 310.